

【头条评论】

# 低空经济崛起助力中国未来产业腾飞

盘和林

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在发展低空经济之前，中国在消费无人机领域就已经成斐然：全球无人机产能的七成、全球无人机专利数量数量的七成，都由中国无人机产业占据。在此基础上发展低空经济，可谓水到渠成。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核心，是推进低空飞行器和B端企业、G端政府的应用场景相融合，通过“低空经济+”来缔造新应用，驱动新经济，同时改善传统产业、公共设施的运营能力。

在近一年里，围绕低空经济，中国诞生了丰富的应用场景，比如“低空经济+农林”“低空经济+体育”“低空经济+电力”“低空经济+安全”“低空经济+国防”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eVTOL飞机技术上走在全球前列，比如EH216-S拿到了全球首张适航证，如今三证齐全，已经进入量产阶段，制造这架飞行器的亿航智能，今年上半年营收增长了4倍。

低空经济是中国重点培育的未来

产业。这是基于两大考虑：一方面是为了奠定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很多时候未来产业并非自然形成，而需要制度规则、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方面齐头并进，共同发展，而很多规则和基础设施需要政府来完善，以低空经济为例，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仅开通了多条无人机航线，还建设了多个无人机起降点。有了这些政府主导建设的必要设施，低空经济发展才能驶入快车道。另一方面，发展未来产业也是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开辟新增长点，提供新动能。

中国的未来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低空经济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而从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态势看，中国在全球名列前茅的未来产业并非只有低空经济。如中国的6G通信技术和产业也是名列前茅，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通信设备军团不仅在规模上大幅度赶超众多对手，在技术上也进步迅速。再如，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是处于全球第一阵营，在AI大模型出现以后，中国国内出现了“百模大战”，这既体现了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在

人工智能产业上的规模和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然而，当前中国发展未来产业还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政策有待完善。很多未来产业是新事物，存在风险性。低空经济就存在安全性风险：一方面是空中飞行器交会可能导致安全事故，另一方面是空中飞行器附带摄像头可能会泄露隐私信息，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制定规则来加以规范。二是存在一些科技短板。很多未来产业的产品都依赖芯片，而中国在先进制程芯片制造上还存在短板，这就对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形成了限制。三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基础设施不仅要建设，还需要合理布局，低空经济就存在这样的挑战，空中导航、地面接引、维修点、充电设施等，都需要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不断完善。

面对这些挑战，该如何应对？从政策面看，中国各地政府要做好两件事：一个是鼓励和激励未来产业创新，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定向扶持，比如给予税收、金融上的支持，比如给予创新应用试点开展的便利，遵循先立后破的

原则，让未来产业先立起来。此外，还需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从实践出发，逐步完善规则制度，让未来产业和监管制度相得益彰，协调推进。

从技术面看，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外部的技术打压和封锁问题。一方面，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突破，摆脱对外依赖；另一方面，要运用外交手段进行有效沟通和反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挖掘和培育国内市场需求，以庞大的内需市场为未来产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应对外部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总之，低空经济的快速崛起是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精彩缩影。而以诸多未来产业发展为契机，中国已经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越来越多的有利位置。相信通过持续加强的政策引导，中国的未来产业将吸收更多资本和人才参与进来，继而走上科技创新发展的快车道。在应对外部技术挑战上，中国也有望化危为机，通过自主研发，突破若干重大技术瓶颈，从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取得进展。

【管理之道】

# 米莱何以驯服恶性通胀？

韩和元

《阿根廷国家报》12日报道称，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于当天举办的Endeavor阿根廷企业家峰会上发言表示，10月阿根廷通胀率为2.7%，系三年来最低水平，通胀下降速度远超预期，创造“阿根廷奇迹”。

米莱在会上指出，当日经济部公布10月通胀率为自2021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全年通胀预期达到120%，略高于政府预计水平（104.4%），但显著优于市场与左翼政府预期。食品仅上涨1.2%，是自2020年6月疫情期间以来食品增幅最小的一次。米莱强调企业家才是解决民众问题的关键。

对于米莱所取得的成就，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早于2023年12月，米莱上任之初就大力实施“休克疗法”，公布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消费者补贴、停止新建公共工程招标等一系列措施，迅速兑现竞选承诺，以此来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带领国家走出泥潭。

当时的阿根廷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2023年全年累计通胀率达到142.7%，贫困率超过40%。阿根廷还面临债务危机，当时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已超440亿美元。

但米莱的举措却引来西方舆论的普遍质疑，我的看法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恰好相反，我对米莱抱有极大希望，因为我对“休克疗法”抱有希望。

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是一种总体经济学方案，由国家主动、突然性地放松价格与货币管制，减少国家补助，快速进行贸易自由化。这个类型的计划，常会伴随将原本由国家控制的公有资产，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措施。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震荡，甚至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名词称之为休克疗法。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但真正践行这一理念的，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他的学生

“芝加哥男孩”——一群来自智利的经济学家。

1975年3月，正值受通胀煎熬的智利，决定邀请弗里德曼来讲学。弗里德曼也欣然接受邀请，前往智利进行六天的公开研讨会。在这段时间里，这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宗师大力宣扬他的“疗法”，建议执政者的经济改革不要拖泥带水，而应大刀阔斧，譬如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放开物价、取消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注入，以此刺激本国产业在竞争中成长和壮大、激活经济。他特别强调，面对问题，执政者应有长痛不如短痛的心理。弗里德曼公开承认，采用这种办法，于短期而言，肯定会付出代价，如通胀也许不会立马下降，但失业率却必然会上升。但正如戒除毒瘾一样，熬过痛苦期，经济将会就此重生。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智利启动改革。经过最初的极度痛苦后，经济逐步恢复，并表现出强劲增长。通胀率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下降到1980年代的不到10%。1976年至198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实际工资与就业率也迅速上升，失业率则明显下降。从1973年起至1995年，在这22年里，智利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两倍半还要多。

采用休克疗法实现自我拯救的案例，还有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联合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主动采用休克疗法：一、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二、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三、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四、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

当然，当时美国经受的痛苦也是空前的，经济衰退到堪比大萧条时的程度——40%的中小企业破产，13%的失业率。但过了1979年至1983年这几年苦日子，美国不仅从1970年代的失败中彻底走出来，还通过激活毁灭性创造机制，造就了一轮大创新，使得美国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

在米莱总统的领导下，阿根廷走出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潭，可喜可贺。祝愿阿根廷能守住战果，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再创佳绩。

【资本策论】

# 增强国有大行资本 做好“五篇大文章”

付英俊

10月12日，财政部部长蓝伟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财政部在加快落实已确定政策的基础上，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其中包括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国有商业银行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

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石，也影响着银行业务发展和创新空间。银行资本包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一级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其中，核心一级资本承担风险和吸收损失能力最强，是商业银行资本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抵御信用风险和市場风险最后“安全垫”。通常而言，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经营过程中利润留存的内源性渠道，二是外源性渠道，包括IPO、配股、公开增发、定向增发、可转债。基于当下市場环境和股价价值水平，核心一级资本的外部补充工具适用性受限。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大型商业银行减费让利的力度不断加大，银行净息差有所收窄、利润增速逐步放缓，资产质量压力上升，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下降。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核心一级资本消耗有所增加。在此背景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需要统筹内部

和外部等多种渠道来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这对于巩固提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发展能力，更好地发挥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仍处于较高水平。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二季度，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8.31%，高于国内商业银行整体资本充足率水平15.43%。今年上半年，六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截至2024年6月30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分别为13.84%、11.13%、12.03%、14.01%、9.28%、10.30%，均高于监管要求。

早在1998年，财政部就有以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形式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的先例。当时，四大行不良贷款超过1万亿元，占其全部贷款的25.6%。同期四大行资本充足率约3.5%，远低于监管8%的最低要求。与26年前补充国有大行资本情形不同，当前国有大行经营整体稳健，资产质量处于健康水平，主要的指标都处于“健康区间”。本次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大行核心一级资本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大型商业银行经营质效，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做好“五篇大文章”，更好发挥大型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压舱石作用。

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可以在短期内快速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但国有大行不能过度依赖外部注

资，应注重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和内源资本积累能力，增强资本补充的可持续性。从优化资本结构入手，推动资产结构转型、收益结构调整，实现资本集约化发展，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挖掘新兴领域市场业务，加快发展中间业务，主动布局轻资本业务。持续进行内

部优化，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控合规和风控管理，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和经营效率，努力实现风险、资本和收益的动态平衡。加快数字化经营管理转型，推进人员结构调整，网点布局优化，持续提升资本、人员、费用等成本产出比。

## 十余省份最低工资标准上涨



诗曰：  
最低工资又上调，十余省份齐出招。  
经济增长虽放缓，社会保障要筑牢。  
因时施策求善治，为民兜底是正道。  
效率公平要兼顾，守望相助春色好。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世相百态】

# 企业管理不能越界

孔德淇

11月20日晚，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从明年起胖东来人结婚不允许要彩礼或付彩礼，彩礼需从简，婚席限邀请亲朋好友且不超过五桌，否则将取消员工一切福利。这一内部规定在社会上引发广泛热议，背后涉及企业管理权限与员工权益的探讨。

当下，天价彩礼等不良婚俗现象屡见不鲜，不仅给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也扭曲了婚姻的本质。胖东来试图通过内部制度引导员工摒弃陋习，树立健康婚俗观，同时避免其因攀比和铺张浪费陷入经济困境，不失为助力移风易俗的一次尝试，出发点值得肯定，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对员工价值观的引导。

但消息一出，网友们众说纷纭，观点鲜明地分为两大阵营。支持者认为，胖东来这一举措如同一阵清风，有助于吹散当下社会中弥漫的不良婚俗阴霾。反对者则表示，婚姻习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域差异，彩礼承载着家族情感与社会关系的维系功能。企业强行干涉员工的婚姻习俗，有越界之嫌。

作为企业，胖东来有权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来规范员工行为，促进企业文化建设，但这必须在合法范畴内进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从法理层面审视，这一规定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对于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我国法律并未禁止彩礼的给付与收受，彩礼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婚姻关系的民间财产赠与行为，其中涉及的婚姻家庭中的财产处分权受民事法律保护，而彩礼规模也并非企业可以随意限定的范畴。这意味着，员工

有权依据自身意愿和家庭情况决定彩礼等事宜。

胖东来这种“一刀切”地限制员工婚礼规模，禁止其接受彩礼，且以取消福利作为违反婚俗规定惩罚措施的做法，已然超出了合理的管理边界，既于法无据，也未在劳动合同或员工手册中明确约定，干涉了员工在婚姻家庭领域的自主权利，也可能因与法律原则相悖而面临潜在的法律风险，引发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显然，胖东来需在企业管理权限与员工合法权益间找到平衡，在遵循法律基础上，让员工尽量寻求与企业理念契合的方式处理婚姻事宜。如创新婚礼形式，以简约而不失庄重的方式举办婚礼，既满足企业期望，又兼顾个人与家庭情感需求。

胖东来一纸禁令背后，也忽视了员工在此方面面临的两难抉择。不可否认，一些员工一方面可能认同企业理念，自愿响应号召践行文明婚俗，为改善社会风气略尽绵薄；另一方面，自身婚姻大事受家庭传统、地域风俗及个人情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难以完全遵循企业规定。例如，一些地区彩礼是婚姻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家族颜面与传统观念，员工很难轻易摒弃。

这也提醒其他企业，在制定关乎员工个人行为的制度文件时，需严守法律底线，审慎评估作出角色，不宜越界干预员工的正常选择和私人生活，同时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深入了解员工想法等。只有确保既合法合规又合乎情理，才能既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又尊重员工的正当权益和个人选择，共同营造一个包容、稳定的工作环境。

【海外听涛】

# 美国财政赤字继续冲高的背后

张锐

在前一财年快速瘦身膨胀后，2024财年的美国财政赤字继续冲高。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24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近1.833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1330亿美元，同比增20%；而从绝对数值看，1.833万亿美元的赤字规模为有记录以来第三高，仅次于新冠疫情期间2020财年的3.132万亿美元和2021财年的2.772万亿美元。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表现为财政赤字。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总收入4.919万亿美元，创财年收入最高纪录，占GDP的17.1%，同比增长4790亿美元，增幅10.8%；同期美国联邦政府总支出6.8万亿美元，同比增加6170亿美元，增幅10.1%，与GDP之比从22.5%升至23.4%。财政收支双增情况下，财政收入无论是绝对增加值还是占GDP之比，都显著跑输财政支出。

2024财年美国国债发行一路提速，加上存量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至10月底超过35.3万亿美元。虽然美

联储已经开始降息，10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利率随之有所回落，但至今依然处在历史高位。受此影响，美国政府债务融资成本依然不小，财政部2024财年的利息支出达1.133万亿美元，同比增29%，这是联邦政府债务利息规模在历史上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

在创造财政赤字方面，国债利息支出成为了仅次于美国国防预算和老年医疗保险计划的第三大贡献力量，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一般而言，当出现财政赤字时，会有三种选择路径：增加收入、增发货币、增借债务。当下，美国政府选择了增借债务这一路径。

理论上说，国债发行量越大，供给过剩状态下压低二级市场利率，同时推高一级市场收益率；另外，美联储在今年虽迈出了降息第一步，但宽松窗口是否持续打开还存很多变数。美国政府负债成本居高难下从而导致财政赤字压力增加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现实中也清晰显示出“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支付利息-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格局。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

未来10年美国国债可能激增20万亿美元，对应的利息支出增加至10.6万亿美元，预算赤字规模将达20.2万亿美元，占GDP之比升至7%甚至更高。

德意志银行的最新分析报告发现，1950年以来的70多年中，美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68年，占比93%，其间林肯执政时期以-10.2%的平均赤字率居首，其执政时正值美国内战期间；紧随其后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平均赤字率为-7.6%，这包括了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开销；拜登、特朗普和奥巴马分别以-7.4%、-6.6%和-5.7%的平均赤字率位列“榜单”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位。显然，除了战争时期，最近的这三任总统(拜登、特朗普和奥巴马)是最能“花钱”的总统，他们的赤字规模也是历史上(除战争时期外)最大的。

财政赤字政策受到历届美国政府的推崇与沿袭，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两党政治结构之使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执政时都非常清楚财政赤字不可无底线地扩张，也应当有所控制，但在两党“轮流坐庄”体制下，为能在执

政时拿出好看的政绩进而取悦于选民并巩固自己的赢选地位，谁也不愿意去冒险因控制与改善财政赤字而牺牲党派前程之险，放纵财政赤字于是成为了历届总统的几乎一致性偏好。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党的执政理念相左，本作为经济问题的财政赤字却最终蜕变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互相较劲与博弈的政治工具。共和党主张“小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和压缩公共支出，而民主党人崇尚“大政府”管理，提出对富人增税并加大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于是，两党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就财政赤字问题在对方身上轻松地找到归因与挑出毛病，进而极尽能事地放大对方的不是；而更重要的是，每当执政党为解决支出不足并提出新增债务发行指标时，在野党就会眼疾手快地运用自己在国会中的力量展开攻击与发难，最终不是酿成所谓的“财政悬崖”之险，就是在双方讨价还价并全部或者部分获得了需求满足后，还会为增量债务打开门缝，两党妥协的机会成本其实就是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财政赤字的日益放大。